



(安心摄)

中国 15 年内会出现人口规模下降

——专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

人口普查的结果证实了学者多年的研究，即中国人口生育率已持续多年大大低于维持人口自身规模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仅为 1.4 ~ 1.5 个，人口老化的速度也因此快于过去的预期，中国人口规模将在 15 年内调头下行。

主笔 / 吴琪

被否定的“马尔萨斯陷阱”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多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你的研究也提到，过去 2000 年的人口数据记录显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每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和过去的观念显得很矛盾。

王丰：世界人口史近些年最主要的

故事，其实是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 1950 年到 2010 年，全世界妇女平均生育水平由 5 个孩子下降到 2.5 个，而中国尤甚，由 6 个孩子下降到 1.4 ~ 1.5 个。

为什么我们老说中国人口压力大，是我们过去对人口的认识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是更早的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过去这 100 年最大的变化是人类自身的变化，全世界人口由 15 亿增加到了 60 亿，增长了 4

倍。我们的期望平均寿命从 20 世纪初的 35 岁，延长到了 20 世纪末的 65 岁。这 100 年内由于人们抵抗疾病的技术加强、营养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快速增长容易让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形成控制人口的观念。

王丰：人口的大增长，理所当然引

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君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内人口众多，这样国家的税收多、出征打仗的人口多，人口数量多被看作一个国家非常积极的因素。从民间的文化传统说，生育对于延续种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传统文化都是歌颂和鼓励多生育的。

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空前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基础是，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人口越多国家越强的想法，自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会越低，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思想也来源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同时诞生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王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要与农业发展成比例，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从马尔萨斯提出理论，至今已有 200 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了他的学说是错误的。从 1960 年到 2010 年，世界人口增加了 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 300%。也就是说，在这 50 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 50%。20 世纪同时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 100 年，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 16 倍，相对于人口总量增加 4 倍，实际上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 4 倍。

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中国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印象深刻，那时候的“英雄母亲”能生育 9 个甚至 10 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不是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呢？

王丰：人口增长有自身惯性，即使

死亡率大幅下降了，整个社会也不是马上意识到的。20 世纪的上半叶全球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人类生活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可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使得大家还是愿意多生，这就造成了人口的快速膨胀。在每 30 年内，人口数量就翻一番。等到大约过了一代人之后，家庭才逐渐意识到，不用再像自己的上辈那样生育好几个孩子，才能保证存活子女的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人口增速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 2.2%。

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饥荒之后的 1963 年，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根据 1964 年的普查，1963 年出生的人口约为 3025 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已经自发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 1970 年的 5.8 降至 1979 年的 2.75，已经接近更替水平 2.1 了。所谓更替水平为 2.1，是指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 2.1 个孩子，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

70 年代的这 10 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迅速的 10 年，这些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人口变化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用高生育率就能保证孩子的成功养育，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王丰：人口确实有它自身的规律，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往往会滞后。当大家处在人口增长的恐慌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曾做了巨大的投入，提倡避孕节育。“二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全球性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在 20 世纪初，女性成年生活期 70% 的时间都花费在了生育和养育孩子上。而到了 20 世纪末，女性成年生活期只需花 14% 的时间来生养子女。

进入 21 世纪后，全世界又回到了 100 年前人口大爆炸前的情况——生育率重新变得很低。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一

对夫妇生 2.1 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从长远说，我们的人口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出生高峰时期来到人世的婴儿，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就造成整个社会“头大脚细”。而如果每一代人都生得越来越少，人口老化的状况会持续加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说法让人挺意外的。

王丰：1970 年至 1979 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其必要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人口多和人口增长快当作一个问题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其实这些年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数量少是好事情，这样人均获得的资源才多。这样理解对吗？

王丰：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国家，财富能够长期增长。欧洲福利国家和日本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回头看，整个人类已经学会了怎么适应人口增长，但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社会的经验，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新课题。

比如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其失业率达到 24%，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 68%。日本当下的年轻人被称为最痛苦的一代，他们不像父辈，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获得了财富的暴增，不仅自己生活舒适，还可以拿出部分救济子女。现在日本经济经历长期停滞，年轻人起步时很艰难，日本 50% 的年轻人是以半临时工的性质开始进入职场的，本来日本公司的传统是终身就业，现在很多是临时工，公司也不会为他们的技能培训、长期发展进行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是不生育，结果使得经济更没有活力，陷入恶性循环。

公共政策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国家感到自己的生育率由过高变得过低，在公共政策上决定从控制人口变为鼓励生育，一

般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王丰：一般说，当一个国家意识到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需要鼓励生育时，政策一般会有10至12年的滞后性。中国在1991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如果在2000年左右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改变政策，那我们的反应还不算慢。但是现在我们又拖了十几年，已经比很多国家对人口现实的反应又滞后了十几年。

我们对人口的很多理解，还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上。现在回顾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我认为当时有几个认识误区：第一，把人口当作一个数字，是很强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是不会增长的。而且家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如果强行砍掉“Family Tree”（家族谱系）的枝枝蔓蔓，对文化是一种粗暴的扼杀。那种“3年内把生育率降低到多少”的提法，只是把人当作了数字。

第二，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在短缺经济下，把人看作基本生活资料的争夺者。

第三，对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认识有局限。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资源状况更多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而不简单是人口数量多造成的。现在关于可燃冰、页岩气的开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前景。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创造力往往被低估了。

第四，人口和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财富是大大高于人口增长压力的。但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压力，提出了咬牙闯关把人口数量短期内控制住。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在1991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计划生育带来的贡献，不然今天我们更是人满为患了。

王丰：我前边提到了，我们在1979年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75，而且如果对比伊朗、泰国等几个国家，会发现它们虽然没有实行中国这样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生育率也与我们下降到相同水平。

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



王丰

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这种说法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翼城在中国广泛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是个例外，它没有强制推行一胎化，但是这些年它的生育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丰：中国刚刚推行计划生育时，山西省委党校老师梁中堂认为这样不符合农村现实，他担心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了生育与政府博弈。而且梁中堂意识到西方发达社会已经出现了人口老化等问题。他认为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放开二胎生育，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后来他的建议获得中央的批准。

山西翼城的经验非常好，但是它的经验没有推广，所以只能算是个特例，

而不是生育政策的特区，特区的经验是应该推广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良好经验很难推广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丰：2001年开始，国内人口学者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人口缩减和老化的危机，开始组织在一起，主要为了研究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独生子女政策要改革，可能存在哪些人口方面的结果？第二，以什么方式来改变比较合适？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对后果也进行了分析，2004年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的集体报告。

当时是作为内部研究，我们的想法是不公开、不炒作，为政策谏言。但是计生委作为利益部门，一直在阻止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呼声。

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些学者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变化开展研究。到2009年，国内26位顶尖的人口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

按照计生委的说法，中国以前的生育率是1.8，后来又说是1.6，但是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4~1.5。在1.4~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1/4。最近几年学者的研究和呼吁，加上社会上老百姓的要求，计生委感觉到的舆论压力大了。在2005年之后，他们又找各种机会夸大出生率，违反事实地去渲染放开生育的风险，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们宣传的内容，和我们作为人口学者研究的结果，完全南辕北辙。

事实上，越多家庭生二胎，对家庭本身来说就是多一个保障。另外我国早已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才是生育子女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把这种权利还给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大家也很担心，

一旦放开生育，会不会出现难以控制的人口局面？

王丰：如果放开生育，第一，短期内社会会有生育补偿，也就是说刚刚放开时，很可能出现一拨儿生育潮。这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引导，让大家知道婴儿潮的孩子以后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面临的竞争更大。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太大，社会总有消化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曾在江苏农村跟踪了1.8万人，其中4000人是有资格生二胎的，但是3年中这4000人里边只有6%的人生了二胎。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的趋势，已经难以扭转。即使放开生育，生育率也很难达到更替水平。比如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里，有10%的人口不生育，大多数人口生育一胎，那需要有一些家庭生育三四个才能平衡这些不生少生的，才有可能达到2.1的更替率。

我们学者也反复研究过，即使放开生育，小品里那种“超生游击队”出现的概率也很小了。现在“80后”、“90后”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不稳定，在城市立住脚的生活压力大，没有经济条件多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追随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扯一大堆孩子。

原来中国的目标是将人口控制在16亿，后来又说控制在15亿，现在面临的现实时，我们看来连14亿人口也不会达到了。人类社会的生育已经下降到极限了，人口增速放慢的拐点已经来临了。

面对人们缩减，我们没有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困境是出生率太低，人口老龄化的状况难以改善？

王丰：如果说20世纪我们出现的人口爆炸是史无前例的，那么21世纪面临的人口长寿和出生率低带来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缩减，也是史无前例的。

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他们有高、中、低三种方案。在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将在2026年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所困。但是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人

口持续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危机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20世纪面对人口大爆炸时，人类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人口多会带来粮食不够、资源不够等各种压力。但是我们事后回顾，会发现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同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人口适当增加带来的好处相当多，年轻人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会大大带动消费。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我们过去总把人的消费看作被动的、资源抢夺性质的。但实际上人的消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现在担心的是东西多没人买，人少了该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问题，中国有没有因为人口基数大，这个问题就变得轻微？

王丰：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人口学家发现，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还是处于增长阶段，但受持续20年的低生育水平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

现在的这种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人口增长的惯性所致。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人口结构将逐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还有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人口的迅速老化和规模缩减，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现实影响？

王丰：20年后，当两个人来支付现在由5个人来付的税以用于赡养不断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时，中年社会肯定将不会是这个样子。而2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研究表明，30～50岁人口的储蓄幅度（也即收入大于消费的幅度）最大，而未来20年内，这个高储蓄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明显下降，由201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时的46%，进而

至2030年的40%。在决定财政收支时，政府也会面临所有老龄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把钱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种现行权利的老人身上，还是花在决定他们和社会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身上？

现在回头看，恰恰是中国比较大的人口数量，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一个老化和人口萎缩的社会，它的经济是很难保持活力的。

三联生活周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普遍与上一代人不同了。

王丰：对，现在的困境其实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育职能被大大弱化了。女性读到高学历，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头几年为了在工作单位站稳脚跟，结婚了还不敢马上生育。我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揭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三个里边就有一个没结婚。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压力大而不生育。

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是东亚文化圈，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一种解释是说，东方人特有的代际之间的亲密联系，使得家长为孩子花费了太多金钱和精力，又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又要帮孩子买房子。东方家长因为太在乎后代了，反而少生育。

我们学者也提出，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倾斜，让育龄期妇女能够有条件安心地生育，让六七十岁的人的财富能转移一部分到二三十岁的人身上。不然女性生育少，全人类都会遭殃。不少发达国家早就开始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丰：中国目前的人口政策只是个历史产物，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有些事情会长期存在下去，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政府应该怎样合理科学地制定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人口缩减的趋势已经无法避免，中国肯定会在15年内迎来人口规模下降的拐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人口老化和缩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时，怎样把养老、医疗等福利体系建立好，来满足今后老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老百姓的期望？